



三（两）江师范学堂

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

苏云峰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9.28531



林批著來見欽此

創建三江師範學堂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八



小學堂

各一所業經前督臣劉坤一護督臣李鴻章籌辦情形先後奏陳在案惟學堂一事體大思精其中等級繁多而次第秩然不可紊越必須扼要探源方有下手之處查各國中小學教員必以小學教員為先

蘇云峰 著

三(兩)江市範學堂

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

南京大學出版社

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此三省各府州縣應需用教員何可勝計

為數浩繁需用教員何可勝計若未經詳

以中小學堂教員必

延訪外國教師研究教育之理講求教授

且詳略參差各學堂

之法總任以中小學堂教員必致疎漏

徒勞辭功且詳略參差各學堂派學程終難齊一經

是荷同司道詳加籌度惟有專力大舉先辦一大師範

選現已延聘日本高等師範教習十二人專司講授

育學及理化學圖畫學各科並選派來賓廣增出身之

中學教習五十人分授修身歷史地理文學算學體操

各科學堂未造成以前暫借公所地方於本年先行開

辦練習教員之法令東教習就華教習學中國語文及

中國經學華教習就東教習學日本語文及理化學圖

畫學彼此名為學友東教習不得視華教習為弟子在

學堂教習又與語理化學等學通知大略東教習亦

能參用華語以教授諸生於問答無虞并格再行考選

張之洞全集卷五十八

七

師範生入堂開學則不必盡備繙譯傳達可免虛費時

刻誤會語氣諸弊收效尤速其購地建堂經費已據江

甯藩司籌撥應用其常年學堂經費如華洋教習各學

生飯食冬夏講堂及操場衣冠雜帶臥具紙筆燈火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
苏云峰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ISBN 7-305-03905-5

I. 三… II. 苏… III. 南京大学—校史—1903~1911
IV. G649.28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3061 号

书 名 三(两)江师范学堂

——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

作 者 苏云峰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8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3905-5/K·263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宋晞教授序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发生鸦片战争,二十二年(1842)中英订立南京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清朝自此一蹶不振,国势日蹙,迭遭帝国主义之侵略。清政府及洋务派人物认为外国之强盛,多赖其利炮坚船;且中国之常受欺骗,多因不谙外语。故自 19 世纪 60 年代始,先后开办了一批外语学校与军事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自强学堂等,咸以学习日、英、俄、法、德等外语为主。在军事方面,如马尾之船政学堂,天津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广东之陆师学堂、水师学堂,湖北之武备学堂及南京之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等。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覆没,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次年在京应试举人 1300 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有识之士认为西学重于西语,人才重于一技一艺。同年六月,清德宗谕各省督抚,限期覆奏悉心筹度之办法。津海关道盛宣怀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率先奏请在天津设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之前身),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奏请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同年浙江巡抚廖寿丰颇重储才崇实,杭州知府林启认为要策励图强,应振兴实学。乃与杭州士绅商议,呈报廖巡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杭州蒲场巷普慈寺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之前身),林启兼任求是书院总办,以“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

义”为办学主旨。

一面主张兴学堂,则废科举之舆论势不可挡,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颁行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在各地兴办学堂的同时,主张维新和关心教育之士,见及师资之缺乏,已成为办学中的最大问题。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义”一文,在“论师范”一节中,结论是“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已将师范教育正式列入其规程,但未作为独立的系统。次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才将师范教育单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系统。

两江总督的辖区江苏、安徽、江西,本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兴办学堂之际,中、小学校发展较速,尤感师资奇缺,遂经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朝廷核准,继任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开始筹办,次年正式开办了三江师范学堂。此为当时江苏省的最高学府,也是南方各省师范学堂的模范。

苏云峰兄对我国近代教育史之研究,贡献良多。继《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之后,完成《南京大学的前身:三(两)江师范学堂,1903~1911》大作,按民国成立以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继承“两江师范学堂”而来,江谦、郭秉文等为承办“南高”之重要人物,切盼苏兄对此专题续作研究。索文于我,爰申述清季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由来以为序。

丽水宋晞写于阳明山华冈中国文化大学

1997年10月10日

研究早期南京大学历史的力作

——《三(两)江师范学堂》简体字版序

在南京大学北园教学区老图书馆前,有一个源流碑,南面刻的是“两江师范学堂”;北面刻的是“金陵大学堂”。这两所学堂,是今日南京大学的前身。尤其是“两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是构成今日南京大学的主脉。

两江师范学堂的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筹办于1902年。今日南京大学的历史,也是从那时开始计算的。或许,正因为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童年,逝去的时间长,资料难觅,所以,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也就一直比较薄弱。1992年5月南京大学9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史》编写组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提及三(两)江师范学堂时,仅有短短十页左右的篇幅。对于学堂的创办、师资的来源、学生的遴选、课程的设置等,都较为简略。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苏云峰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教育与现代化的研究。继完成《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等教育史专著之后,又写出了15万余字的《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

1998年版)一书。该书共8章,叙述了三(两)江师范学堂的创办经过,介绍了学堂的师资力量、学生来源、课程设置等情况,并对学堂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全书以资料说话,在勾勒三(两)江师范学堂发展历史的同时,也为了解南京大学,尤其是为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献上了一份厚礼。

作为目前惟一的一部研究三(两)江师范学堂的著作,该书具有下列的特点。

一、考辨清楚了三江师范学堂创办的原因与过程

三江师范学堂的建立,是晚清中国大力提倡新式教育的产物。随着传教士对西方学制的引进和维新派人士对学校教育的推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令,要求全国改书院为学堂,并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奏的《钦定学堂章程》。由于学堂的设立,作为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时,刘坤一、张之洞、张謇等人都意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1902年3月,张謇在江苏南通筹备设立“通州师范学堂”,开我国师范教育的先河。同年5月,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上《筹办学堂折》,呈请在督署江宁(今南京)办师范学堂。但该年9月刘坤一病逝。次年2月,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后,继续考虑办学之事,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要求在江宁设立三江师范学堂,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培养中小学堂的教员。1903年下半年,张之洞选定北极阁前明代国子监旧址为学堂校址。学堂筹备后,聘请日本教习讲课,并与中国教员互相交换知识。这是我们知道的三江师范学堂创立初期的情况。但为什么张之洞要延聘日本教习、延聘了哪些日本教习,这些教习在三江师范学堂期间表现如何,却是不太清楚之事。苏云峰先生挖掘了一系列资料,理清了三江师范学堂创立初期的一系列问题。

苏云峰先生认为:“20世纪初中国之留日风潮和各省学堂之所以争聘日本人为教习,与张之洞有一定的关系。”(原书第7页,

以下涉及页码均为原书页码)。作为晚清的重要人物,张之洞经历了从抵制日本到利用日本的思想转变过程。张之洞之所以重视日本,除日本易于仿效之外,还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因此,张之洞除主张留日外,还竭力主张延聘日本人担任中国文武学堂、新军和政府部门的教习和顾问,促使中国各方面的革新。因此,三江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是由张之洞亲自与日本东亚同文会直接交涉,订立合同,许以高薪延揽而来的”(17页)。而“学堂建造规模、学制及一切课程办法,均有湖北师范学堂堂长胡钧来宁负责。因胡氏两湖书院毕业后,奉张氏派遣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后又赴日本考察,对日本的教育相当了解。胡氏遂仿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规模来设计三江师范学堂。”(6页)因此,三(两)江师范学堂的建立,不仅在教育史上值得研究,在中日关系史上也值得研究。正如苏云峰先生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方面,要借重日本教习的学识与经验,改善中国师范教育品质;日本政府、民间团体东亚同文会和日本社会舆论,均思扩大日本教育在华的影响力,与西方教会学校相抗衡。”(第39页)早期中日教育交流中的这一页,是张之洞联日政策中的一个环节,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三江师范学堂先后聘请了32位日本教习。其中仅2位任期在5年以上,其余均为短期。究其原因,一是日本教习的月薪是中国教习的四到六倍,招致中国教习的反对;二是日本教习之间发生内部摩擦,致使学堂难以应付。因此,学堂逐年减少聘请日本教习的数量,并缩短聘期。1911年辛亥革命后,两江师范学堂遭到了革命军的占领,教学仪器、设备等多有损坏,日本教习也因此回国。此后,学堂一直处于停办状态。1915年6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学,标志着两江师范学堂的正式结束。

从三江师范学堂改为两江师范学堂,其原因一直有多种说法。作者引用当时的《东方杂志》,认为是江苏绅士提议“正名”,理由是

两江总督之职权,至雍正元年(1723年)起,就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改为两江师范后,仍为三省公学,无须以三江为名。而且改名的时间是1906年6月,不是《南京大学史》中叙述的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的宗旨,主要是培养三省中、小学教员。但1906年改为两江师范学堂之后,学堂总监李瑞清等人接受日本总教习松本孝次郎的建议,“停办初级师范,单独发展优级师范,使两江师范成为纯粹培养中学各科教员的场所”。因此,“三江”改为“两江”,不仅仅是名称之改,在培养目标、管理方式等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三江师范系属于初级师范程度,培养小学师资;而两江师范则属于优级师范程度,培养中学师资。”(115页)“在课程方面,使其实用化和多样化。在学生管教方面也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和两江师范时期大不相同。”(115-116页)这些,都是今日师生所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作者的研究,加深了对南大早期历史的了解。

二、对三(两)江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生源、师资等情况作了介绍

三江师范学堂是清政府投资最多、设计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堂,是当时江苏省的最高学堂。《三(两)江师范学堂》一书,根据《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等资料,对学堂的学制、课程设置、师资等方面情况作了多方面的介绍,再现了当年三(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场景。

在三江师范学堂时期,学堂设一年“最速成科”、二年“速成科”、三年“本科”。共开设课程17种,比《奏定学堂章程》多出“生理、手工、英文、东文及随意科之农业与法制经济等六科,而删除习字一科”。(42页)学生在学堂期间要学习修身、教育、文学、历史、舆地、数学、理科、图画等课程。至两江师范学堂,1906年7月开办优级师范本科“公共科”,学生一概通习,类似今天的“公共课”。1907年10月起,设优级本科之理化数学部、博物农学部 and 图画手工三个选科。学生在学堂期间要学习伦理、经学、国文、英语、教育

及心理等共同课程;以及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分科课程。作者认为,从“分类科和选科的课程、每周授课时数和每周多次的试验来看,兼顾理论和实际,不尚空谈。尤其是图画手工选科,可以说是一门特殊的课程,受到两江师范的特别关注,在学堂里设有木工场、金工厂、农场和养蚕室,训练这些传统功名出身的青年手脑并用,从事实际的生产工作,颇具时代意义”。(54页)

三(两)江师范学堂的学生,来源于江苏、安徽和江西,通过考试后入学。在三(两)江师范学堂存续的8年中,共招收了学生1600多名,其中三江师范学堂时期300人左右,两江师范学堂时期1300人。若不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导致学堂关门,两江师范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会更重要。

三(两)江师范学堂的师资,除延聘日方教习外,还公开招考了一些中国教习。在三(两)师范学堂存续期间,前后共4次招考,选聘了70名中国人充任教习。由于当时缺乏经过现代教育专门训练的师资,因此,只能从具有传统功名和官衔的人士中选择具有留学背景或有现代学识的人员担任教习。这些人员中的一些人,由于出身与学生相似,知识结构不合理,遭到学生的批评,学堂曾从这些教习中选择一部分人赴日本学习。学堂延聘的中方教习中,也有一些著名的人士,如姚明辉、王益霖、柳诒徵、刘师培等人,都曾是学堂的著名教习。

三、对三(两)江师范学堂的组织和学堂的作用作了评价

三(两)江师范学堂,并不是因为孕育了今日的南京大学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它本身的诞生,就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台湾地区近年来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理解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作为人的现代化中的教育,更是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苏云峰先生认为:“两江师范是20世纪初中国新教育现代化的缩影。它既有浓厚的传统,也有逐渐蜕变的现代性。就传统而言,如师生均出身功名,教职员都以官衔见称,学生毕业后授以

师范科举人贡生之名和相当的官衔。学堂人事管理和运作带有传统管理习性。早期对学生的生活和言行,采取严格的思想控制。现代方面,如学制和课程内容,均仿制日本和西洋。在这中西交汇和蜕变的过程中,开明的学堂监督也转变成既重视科学技术之应用,也鼓励思想之自由和学术之独立。而学生中也有参与革命运动者。”(170 页)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由于日本教习几乎取代了西方教会学校的地位,主导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引起美国传教士的恐慌,游说美国政府以退还之庚子赔款,兴办美国式教育和鼓励游学美国,而有清华学堂之设立。”(详见作者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这种在大背景下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思路,确实值得推荐。

作者认为,三(两)师范学堂的组织和重要人事发生过重要的变化。三江师范学堂时期是“不健全组织和人事”(95 页),设有总办、总稽查、提调、督学及监察等 28 个管理人员。而到了两江师范学堂时期,改总办为监督,废除了提调和总稽查两个职位;在监督之下,设立教务、庶务和斋务三长,使行政组织得以改善,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尤其是监督李瑞清和教务长雷恒,“虽然都是进士出身,但都关心西方学术和教育发展,具有新思想”;“对两江师范积极经营,开发新课程,注重手脑并用,智德兼修。”对学生“采取比较自由开放的态度,爱护学生,鼓励开放胸襟,学习他人之所长,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109 页)作者尤其对两江师范学堂时期的监督李瑞清的贡献作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李瑞清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读书人”,而且有“领导才能”和“浩然正气”(113 页)。“李瑞清在两江师范监督六年任内,提高学生程度,提高中、日教习之素质,增加堂舍设备,建立金工、木工、图画实习室与农事试验场,供学生手脑并用,智识兼修。他爱护学生,视学生如弟子,学校如家庭,奖励自动,培养人格,以中西哲人为期许。”(114 页)在李瑞清的身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格,代表了清末知识分子的进

步性。正是由于李瑞清的贡献,才使两江师范学堂得到了大的发展。

《三(两)师范学堂》一书,还附有两个珍贵的资料。一个是《三江师范学堂章程》,详细介绍了学堂的办学目的、考试规则、学科课程、讲堂规条等,对了解三江师范学堂的历史大有裨益。原件为日本一教授所藏,可能是孤本。作为附录公开问世,功莫大焉。第二个是“两江师范学堂学生名录”。作者根据清政府学部档案中两江师范学堂历年呈报的学生学籍资料,按各科次序编制而成,反映了两江师范学堂的规模与成就,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至于书前所附的三(两)江师范学堂的照片,则为加深读者的见识和理解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作者在全书前的“自序”中说:“我之所以研究三(两)江师范学堂,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一路追踪张之洞在各省的教育兴革,曾写过他在四川创办的尊经书院(未刊稿)、在湖北的教育改革和在广东创办的广雅书院。现在应写他在江苏所创办的。张氏在江苏创设了储才学堂、江南陆师学堂和三江师范学堂。其中三(两)江师范学堂可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样板,且有中日关系的背景和民元后的发展,所以我选择撰写它的这一段历史。第二是受两位日本教授的鼓励。1984年4月底5月初,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细亚研究研究室长阿部洋和东京专修大学商学部副教授阴山雅博两次来访,交换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心得,并赠其所编著的《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一书,其中有一篇阴山介绍三江师范日本教习的论文,加强我研究它的兴趣。第三是我在教育部档案室清季学部档案中,找到一批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档案(见征引书目),使我有信心可以重建这所学堂的历史。”作者于1986年写作了该书的初稿后,到1996年才将旧稿进行补充整理,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三(两)江师范学堂的存续时间也就8年,作者写作此书前后历时达10年,态度之认真也可见一斑。作者的这部著

作,不仅仅使南京大学的早期历史得到了清晰的描述,而且对了解中国教育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大有价值。

最后要说明的是,作者以张之洞的奏折和三江师范学堂校址之确定为学校的开端,将三江师范学堂的时间上限定为 1903 年。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 1902 年 5 月便有创办学堂之奏折。从时间上讲,刘坤一的奏折在前,张之洞的奏折在后。所以,今日南京大学以 1902 年为学校的发端。

本书原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第 82 种。承蒙苏先生赠书于我,使我得以先睹为快,了解了早期南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些不清楚之处。2002 年 5 月,南京大学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我致信苏云峰先生,希望能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作为百年校庆的纪念。苏先生慨然应允,并寄来了勘误表。此情此谊,令人难忘。在此对苏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志强

2001 年 5 月 25 日

自序

三(两)江师范学堂,为清末实施新教育后规模最大,设计最新的一所师范学堂。我之所以研究三(两)江师范学堂,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一路追踪张之洞在各省的教育兴革,曾写过他在四川创办的尊经书院(未刊稿)、在湖北的教育改革和在广东创办的广雅书院。现在应写他在江苏所创办的。张氏在江苏创设了储才学堂、江南陆师学堂和三江师范学堂。其中三(两)江师范学堂可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样板,且有中日关系的背景,和民元后的后续发展,所以我选择撰写它的这一段历史。第二是受两位日本教授的鼓励。1984年4月底5月初,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细亚研究研究室长阿部洋和东京专修大学商学部副教授荫山雅博两次来访,交换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心得,并赠其所编著《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磨擦》一书,其中有一篇荫山介绍三江师范日本教习的论文,加强我研究它的兴趣。第三是我在教育部档案室清季学部档中,找到一批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档案(见征引书目)。使我有信心可以重建这所学堂的历史。

1986年初费数月之力,完成三(两)江师范学堂初稿约六万字。但内容有待充实,论文结构也尚待调整。因为当时要参与其它研究计划,所以就搁置下来,其间仅于1993年4月,应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之邀,于“教育历史和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

表“张之洞与三江师范学堂的筹建”一文,直到去年10月出版《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以后,才重新检出这个旧稿来,进行补充和修撰工作,经半年之努力,扩充为12万余字,此外还有相当分量的附录。

本专刊虽然是一本小书,但如果没有接触档案的机会和好友的帮助,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首先要感谢“教育部”。在1972至1986年间,“教育部”两次同意我利用其所藏之前清学部旧档,让我完成了四本专书,^①成为国内惟一的最大受惠者。其次,我要感谢东京专修大学商学部荫山雅博教授,除他的论文为我所借重以外,他还热心地寄赠其所藏《三江师范学堂章程》孤本,并代查《南洋官报》和《大公报》等有关资料,让我能一窥该学堂创办之初的设计规模和经营管理制度。我也感激美国 Denison University 秦博礼(Barry Keenan)教授,不时提供有关三(两)江师范学堂的信息和史料,给我很大的精神鼓励。感谢前助理萧佑如小姐和本院计算机中心,将近1000人的学生资料,输入计算机(磁带),制作成六个很有意义的统计表后,依姓名笔画排列成一个分科的学生名录,作为本书之附录。三(两)江师范学堂建筑据云是模仿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但实际情形如何,不得而知。感谢本所研究员张启雄先生提供载有早期建筑图片的《东京大学の百年,1877~1977》一书,让我得以对比查证。感谢吴凤莲小姐打制本书附录,助理林美慧小姐反复校对修订和编制征引书目。感谢两位专刊审查人除纠正错误外,还提供宝贵的意见。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宋晞教授允以“清季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由来”一文为序,弥补本书之不足。

^① 这四本专著是《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和本书。

本书之出版,还另有一重要意义,它或许可以让我们回顾一下20 世纪初中日关系和它的教育产物。疏漏乖谬之处在所难免,尚请方家不吝指正。

苏云峰写于南港“中央研究院”

1997 年 9 月 2 日

目 次

宋晞教授序	1
简体字版序	3
自序	1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日本教习之延聘、冲突、撤换及其所扮演之角色	15
第一节 延聘日本教习——张之洞与东亚同文会之交涉	15
第二节 日本教习间之冲突和撤换	23
第三章 学制变革和课程之提升	38
第一节 三江师范时期：初级师范课程	39
第二节 两江师范时期：优级师范分类科课程	45
第三节 关于教科书及教材之供应问题	51
第四章 学生背景、学习、生活管理与成绩表现	55
第一节 学额、招生问题与历年各科人数	55
第二节 学生籍贯、年龄、学历与功名统计分析	66
第三节 学生生活管理与毕业服务	71
第四节 毕业人数和成绩表现	80